

日中战争史研究的课题

笠原十九司

关于日中战争史研究,笔者拟就自己一直以来关心的领域提出在研究过程中碰到的二三课题。提出这些课题,当然是希望中国的研究者们今后也能以其作为需要认真对待的研究对象,同时更期待着将来能够召集日本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中国学者,还有欧美各国的研究者共同举办相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从世界史的视点出发深化这些课题的研究。

一、厘清中国城市被日本海军航空队轰炸的事实与受损情况

笔者曾就淞沪会战(第二次上海事变)爆发的起因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一文^①,其中详细论述了此战乃由日本海军策划发动的事实。1937年7月7日,以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索日本在华北挑起了所谓的“北支事变”,日本海军为借机将战争扩大至其所辖作战区域内的上海,于是密谋在8月13日发动了攻击。此举在于将战场扩大至华中、华南,如此一来其航空队即可在中国全境对所有的城市展开战略轰炸。

大山事件的阴谋最终得逞,日本海军成功地将战火从华北燃至华中、华南,1937年8月15日,海军远程轰炸机群从长崎大村基地起飞,强行对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实施了“越洋轰炸”。从当日起到日本陆军12月13日占领南京,日本海军航空队无日不对南京进行空袭,首都南京众多市民被夺去生命,财产损失也极为严重。

笔者还专就日本海军参战的情况进行过考察^②,详细论述了海军航空队自1937年8月14日轰炸杭州、广德开始,至1941年9月15日,连续不断地对中国全境的城市及铁路、港口、军事设施等进行空袭的情形。

日本海军航空队自1938年12月至1941年8月末所实施的重庆大轰炸,是以摧毁抗战时期的首都,并大量残害陪都居民为目的的城市无差别轰炸。重庆大轰炸持续时间之长、参战轰炸机之多,如天文数字般庞大的投弹量,以及将重庆的街道划分为数区,逐个顺次进行地毯式轰炸的精心布置,其残暴性在世界空袭战史上都堪称空前。在1940年的“一〇一号作战”与1941年的“一〇二号作战”中,日军每天都出动100架以上的轰炸机投掷各种威力巨大的炸弹,就连日军自身都将这些飞往重庆的轰炸机称为“重庆定期航班”。如此轰炸,使重庆市的主要街道皆被破坏,房屋俱毁,市内道路弹坑密布寸步难行,街区满目瓦砾,整座城市已然化成一片凄惨的废墟。

对城市实施空袭,虽是违反战时国际法的战争犯罪,但即使在今天禁止空袭的国际法也难称完善,更何况当时。因为美军也对日本城市实施了大规模无差别空袭,但对美军此举却不能定罪,因此在东京审判中日本海军航空队对中国都市的无差别空袭也就未被提起。

今后需要继续给予关注的课题是,在全中国范围内调查日本海军航空队长期以来对各个城市

① 笠原十九司著,孟晓旭译:《大山事件的真相——日本海军“阴谋”的追究》,《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4期。

② 笠原十九司「海軍の日中戦争——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への自滅のシナリオ」,平凡社、2015年。

及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所造成的损害。可以认为,日中战争期间日本海军率先实施的空袭战法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为美军所继承。其结果是美国军机对日本各个城市进行了空袭,并最终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有现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朗内战中,空袭战已经作为现代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被继承下来,就这一点来看,我们更应该对首开世界空袭战先河的日本海军航空队轰炸中国城市的历史意义进行批判性研究。

二、调查并摸清南京保卫战中阵亡国民党士兵的家庭情况

就南京大屠杀事件(以下简称“南京事件”)而言,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士兵,有很多并非处于战斗行动之中但仍被违反了海牙陆战法规的日军所虐杀。有关其人数,笔者曾做出如下判断:

总数 15 万人的守军当中,估计约有 4 万人逃出南京后再度集结,约 2 万人在战斗中死伤,还有约 1 万人在撤退中逃亡或下落不明,剩下的 8 万余人在被俘、投降、失散的情况下惨遭屠杀。^①

笔者也曾汇总过南京保卫战中国参战军队的构成与编制,并且简单地分析了各部队的战斗经过。^② 基于这一考察,得出了上述被屠杀士兵数量的统计。除上述笔者估算在南京事件中为日军所屠杀的多达 8 万余名中国士兵外,还有 2 万余人因在作战中死伤而不被日方视为大屠杀牺牲者,另有约 1 万人在撤退、逃亡途中下落不明。在中方看来,这些都是日军侵略南京的牺牲者。

在南京保卫战及南京事件中,据笔者估算,大约牺牲了约 11 万名中国士兵。但是,日本人之所以对其残酷性、悲剧性无动于衷,是因为他们未能将如此多牺牲士兵的姓名、长相,还有其出身、家庭等付诸鲜活的想象。

日本人只对被认为是战争受害者的日本兵怀有强烈的同情,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能唤起对战死或病死、饿死士兵的姓名、长相、住址、家中兄弟及其生平等的具体记忆。

因而,如果能弄清牺牲中国士兵的出身,并进一步加深对痛失子弟等生活依靠的遗属们困苦生活的认识,即便是日本人恐怕也不会再简单地否定南京事件这一悲剧。

因此,我尤其想对中国学者们提出的课题是,整理并把握日中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如何征兵,被派来保卫南京的士兵们是从哪一省哪一地区应征入伍,抑或被强行抓丁的。在很多南京攻击战参战日本士兵的战时日记中都有如此描述:冲进中国军队的工事时,他们看到的竟是为了防止逃跑而被锁在炮位上的中国士兵。可以认为,这些中国士兵应该是被强行抓丁,然后分配到那些堡垒中去的。

这些阵亡中国士兵的家属,是否接到过其已牺牲的消息,虽然国民政府在制度上有明文规定,但遗属们是否得到过经济上的补偿或津贴。上述这些实际情况如果能够稍加廓清,那将推动人们在总体上对南京事件残酷性、残暴性的认知。如果使用“南京大屠杀”这一称谓,人们的注意力将更容易集中到“杀害的方式”“伤亡人数”等方面,而像“南京大屠杀事件”这样加上“事件”一词,我们就可以甚至把“事件”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也纳入考察范围,这也是笔者使用“南京事件”这一用语

① 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岩波新書、1997年、225頁。

② 笠原十九司『南京防衛戦と中国軍』、洞富雄・藤原彰・本多勝一編『南京大虐殺の研究』、晚聲社、1992年。

的理由。这一点,与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否定派因主张“非为大屠杀,仅乃一事件”而故意称其为“南京事件”的意义截然不同。

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一是以国民党军为主的“正面战场(国民党战场)”,另一则是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同日军作战的“后方战场”(敌后战场)或称“解放区战场”。在中国,“正面战场”上牺牲的国民党军士兵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被视为抗日战争研究的对象。

在日本,笹川裕史、奥村哲的著作先行梳理了四川省国民党军的征兵实情。^① 该书提到,国民政府虽然有着作为法定制度的征兵制,但因户籍记录的欠缺,县、村等行政组织的涣散,这些制度无法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因为国民政府强制向各县、村摊派征兵名额,所以经常发生绑架穷人及外乡人充当兵役的事件。可以想象,前述在南京前线被锁在炮台上的士兵,很有可能就是这样被强行“征”来的。

很多国民党士兵以“征兵”的名义被绑架而来并被分配到“正面战场”做出牺牲,这些士兵或在战斗中阵亡,或被日军屠杀又一次牺牲,如此一来,他们被迫付出了双重牺牲。另一方面,“解放区战场”上士兵们自愿、自觉地参加抗日游击队,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员,这一“征兵体制”与国民党的差异是明显的,国共军队于抗战意愿和抗战能力上的差别也可在此找到原因。

三、发掘华中、华南地区日军“治安战”的事实

日本所谓的“治安战”,在中国被称为“三光政策”或“三光作战”,指的是日军对“解放区”“抗日游击区”的“烬灭扫荡作战”(烧光、杀光、抢光作战)。对于此一课题,笔者曾写过一系列文章、专著进行论述。^②

就日本人认识“三光作战”的实情及全貌的重要性,笔者也曾主张如下:

南京大屠杀事件(简称“南京事件”)作为战时日军侵略、残暴的象征经常被人们提及。然而,在三光作战中日军屠杀、暴虐的恶行,才更是依照正式的作战计划,以杀光、烧光解放区及抗日游击区军民为目的而实行大规模扫荡的结果。无论从军事思想、作战行动来看,还是从实战状况、牺牲人数来看,三光作战都可谓是日军侵略性、残暴性的典型象征。如果我们掌握了三光作战的实际规模、作战过程及受损情况,进而能将其全貌以具体鲜活的形象展现给日本人的话,我想他们就不会单方面地否定中方所讲的侵略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③

关于日中战争中被日军杀害的中国军民的人数,中国方面主张有“3500万人死伤”。19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中国军民死亡1000余万人”。对于这些数字,有很多日本人都认为是“中国人特有的‘白发三千丈’式的夸张”而持否定态度。日中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实施大屠杀的事实不为日本人所知(也没有人提起)是使其倾向于持否定态度的主要原因。

① 笹川裕史·奥村哲『戦後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岩波書店、2007年。

② 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三光作戦——未来に生かす戦争の記憶』、大月書店、1999年;『治安戦の思想と技術』、倉沢愛子ほか編『岩波講座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5』、岩波書店、2006年;『日本軍の治安戦——日中戦争の実相』、岩波書店、2010年。

③ 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戦』、21頁。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曾对日军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实施治安战的情形进行了描述^①,另外日军华北方面军相关的资料也比较齐全,所以笔者此前的研究都以华北为中心。

但是,就华中和华南来看,日军对华中的新四军根据地及抗日游击区也实施了治安战,还有如前引拙著《海军的日中战争》(海軍の日中戦争)中简单提及的那样,海军在其侵略并统治的海南岛也推行了三光作战。在华中和华南,对于国民党军方面的抗日游击区及红枪会、大刀会等民众自卫组织以秘密结社为纽带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地区,日军同样实施了三光作战。在国民党政府作为抗日后方基地而推进“西南建设”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国军方面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比较活跃,日军也对这些地区实行了三光扫荡作战。

日军在华中、华南实施治安战的相关资料已经散失,对其进行调查、搜集并非易事。但在中国,由省、县等党史研究部门及各级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的资料搜集与研究是有相当进展的。如果日本研究者在开展有关华中、华南方面军相关资料调查、研究的同时,还与中国地方史研究者合作进行调查、研究的话,可以期待,这将会大大推进对于日军在华中、华南实施的治安战的研究。

[作者笠原十九司,日本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译者孙雪梅,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郭阳)

德国反省中的另一面： 东德如何处理有关第三帝国的历史记忆

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一般中国学者会认为德国对二战历史的反省彻底而又没有任何遗留,但事实上德国人的反省不是这样简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26年前,当德国统一时,大概没有多少人能预料到东、西德在反省希特勒第三帝国的问题上会出现明显的区别。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一个成功面对第三帝国历史的国家,它的精英阶层包括知识分子,都以为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众也会认可这一成功,接受西德有关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叙述。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随着极右翼思想在东德年轻人中影响越来越大,德国一部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研究东德的记忆文化及其对第三帝国的反省。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之一是假定极右翼的影响力建立在年轻人对希特勒第三帝国历史的误解之上。其实,东德极右翼势力产生的原因不仅在于对东德现实的不满,也与不接受西德对过去的反省态度有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西德反省中的内在尴尬,即通过责备自己过去的错误来求得国际认可。而这种自责的态度,又引出一个“非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和以“非民族主义”自傲的精英阶层。在全球化时代,这样的态度固然对适应新的形势很有利,但是,一部分民众,特别是底层平民因感觉到国家不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处于不安之中。

^①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1)」,朝雲新聞社,1968年;「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2)」,朝雲新聞社,1971年。